

中国企业的崛起，需要中国企业的崛起；国际化的意义，在于国际化的群体，又该在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等；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国际化的意义，在于国际化的群体，又该在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等；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国际化的意义，在于国际化的群体，又该在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角色等；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 王辉耀◎主 编 |

中国海外发展

海外看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化，需要中国企业的崛起、国际化、走出去作为支撑。

東方出版社

王辉耀◎主 编

中国海外发展

海外看中国企业“走出去”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岸扬
装帧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刘泰刚
责任校对:张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外发展:海外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王辉耀 主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60-4145-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企业-对外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333 号

中国海外发展:海外看中国企业“走出去”

ZHONGGUO HAIWAI FAZHAN HAIWAI KAN ZHONGGUO QI YE ZOUCHUQU

王辉耀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5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4145-4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C 目录

CONTENTS

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研究中心 2012 年度报告

第一章 中国的海外发展战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导宋立刚：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机会与挑战 /1

澳洲储备银行货币研究所精算中心荣誉主任郭生祥：对于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 /9

第二章 中国“走出去”的挑战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企业走出去 /14

加拿大知名华裔时事评价家丁果：中国面对人民币的公关危机 /22

加拿大麦科文大学商学院亚太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魏小军：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的跨文化冲击 /24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张康清：加拿大民意调查的启示：西方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喊“不”的原因分析 /38

第三章 中国“走出去”的破围

北京市侨联副主席陶庆华：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与“当地化”的建议 /49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教授赵红心：中国企业国际化中市场进入和人才培育的探讨建议 /52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暨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武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企业走出去的温州模式及其海外移民发展 /64

第四章 企业走出去与人才竞争

美国花旗集团房贷高级副总裁张风波：中国走向世界的管理体制与人才战略 /85

加拿大怀雅逊大学管理学教授林小华：突破企业国际化的人才瓶颈：海鸥方案解信任难题 /91

西门子公司（SIEMENS）美国研究院研发部主任方彤：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打造中国“世界五百强”高技术企业 /97

第五章 全球产业链中的产业升级

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周玮生：低碳中国的战略选择 /101

加拿大 Platform Computing 公司董事长周松年：云计算：中国经济升级的基础设施与机遇 /114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管坤良：新医药产业的发展及中国的对策 /121

第六章 海外发展与软实力输出

美国卡特中心担任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中国特殊论”意味着什么？ /126

中国十届五次全国政协海外代表唐林：善用西方的规则玩西方的游戏 /135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副教授王坚：关于中国对外传播工作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143

第七章 圆桌献策

2010 欧美同学会海外高层次人才座谈会·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主题
座谈会 /151

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国家战略与人才引进
分论坛 /168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完善千人计划座谈会 /174

第八章 CCG 建言

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建言献策 /201

第一章 中国的海外发展战略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机会与挑战

宋立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经济与政府学院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其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主要学术著作有：《全球比较优势的变迁》（Addison - Wesley, 1996 年），《中国所有制转型：进程，结果与前景》（世界银行出版社，2005 年，英文合著）等。

本文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全球制造业大国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应对战略。本文首先简述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从而为讨论现阶段中国工业化特征提供一个历史参照系。然后从三个角度分析下一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即由于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对中国汇率调整以及扩大内需的压力，如何走一条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及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及其相应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最后就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一、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工业化进程

1. 国际比较

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模式取决于该国经济战略的选择。仅从经济意义上看，这一选择有赖于该国在储蓄与投资关系上所作出的决策，其决策基础则是该国的劳动力与非劳动力要素供给状况以及本国已有的技术水准。一个国家经济战略的选择还取决于当时的国际体制的性质与特征，例如该体制是否有助于商品、要素、劳务以及技术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与转移。这种经济战略上的选择及其结果决定了一国生产率的增長以及该国绝对和相对生活水准的提高。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战略由先进区域向那些具有雄心和动力的区域扩散并使这些区域加入到核心区中来。这种经济战略上的转移伴随着国与国之间对全球领导权的动态性竞争以及世界范围内经济重心的转移与分布。中国近年来来作为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崛起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最新例证。

以人均收入水准来衡量，中国的崛起是在十分低水平的基础上发生的。以任一时点上一主要国家的人均 GDP 作为生产率前沿，那么中国在 1980 年时只是该前沿的 2.1%。与之相比较，日本在 1950 年时已达到世界生产率前沿的 20%，韩国在 1960 年时达到该前沿的 11%，美国则在 1870 年时就已达到生产率前沿的 75%。到了 2008 年，中国的人均产出仅达到了以美国生产率为前沿的 13%。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尚未成熟的阶段。

以城市化水准来衡量，198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 20%，日本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韩国在 1950 年，美国则在 1860 年就达到了这一城市化水平。到了 2008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45%，这一水平同日本 50 年代、韩国 70 年代以及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相当。中国计划到 2030 年使其城市化率达到 60%，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时，日本在 60 年代、韩国在 80 年代中期便达到了这一城市化率。

从投资角度来看，自 1978 年以来，中国的年平均投资率（资本形成占 GDP 的比重）为 38%，其中 1993 年则高达 44.5%。高投资率的背后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其年平均为 41%，2008 年时则高达 53%。然而，中国的人均投资水平却不高。1978 年时人均投资水平仅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 2%。韩国在 1960 年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 4.8%。那时日本的人均投资水平已超过经合组织国家水平的 27%，到了 1991 年，其人均投资水平已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 238%。相比之下，中国 2007 年的人均投资率仅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 10%。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存量特别是人均资本存量仍是很不足的。

从资源强度来看，1978 年中国人均钢产量仅是美国 1900 年人均钢产量水平的 27%，而到了 21 世纪初则达到了该水平的 300%。中国在 2003 年以前基本能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美国在 1957 年以前也能满足其对能源的需求。那时，美国每千人拥有汽车量已达 327 辆（1988 年时达到每千人 547 辆的高峰）。日本在 90 年代末期，韩国到 2006 年才达到美国 1957 年的水平。到 2006 年，中国每千人拥有汽车量仅为 18 辆。中国未来人均能源与资源消费水平的提高，将对世界能源与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平衡产生重大影响（Garnaut and Song, 2006）。

这些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尚未完结，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与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发展战略的定义：出口导向与出口依赖

区分主要工业国发展战略的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是看其在世界市场中产出与出口的份额及其变化。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保持出口占 GDP 平均份额的国家将按同比例扩大其在世界出口中以及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这一情形表明一种较为均衡的增长模式。如果一国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大于其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那么这一结果反映出该国的发展战略倾向于出口依赖。出口依赖有别于出口导向，后者指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的态势与程度。主要工业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

19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是崛起中的大国里面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发

展战略的范例，20 世纪初的第一个 10 年，美国经济坚定地走上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对外贸易与外资在 19 世纪中叶的美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对外贸易与外资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大大下降了。那时的美国充分利用了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来发展其生产技术，并充分享受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好处。这一战略的实施使美国成为全球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国，其在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下半叶。

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亦反映在其制造业在出口份额的上升，以及制造业在其进口份额的下降上。日本和韩国在其高速增长期间也有相同的经历。日本在其高速增长的初期与中期实施的是一种外向型发展战略，但那时的日本经济并不是出口依赖型经济。这是因为，日本经济从 60 到 70 年代期间，其在世界总贸易与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基本上是按比例上升，并且更倾向于在世界总产出中份额的上升。然而，自 80 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战略出现了重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日本在世界总贸易中份额的上升速度大大高于其世界总产出中份额上升的速度。日本经济日益成为出口依赖型经济，其后果不言而喻。

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对外开放初期（80 年代）的增长路径，是以增加中国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份额，而不是增加其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为特征的。然而，从 90 年代初开始，其路径逐步向增加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的方向转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例如外商在中国总出口的比重超过了 50%。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世界总产量中的份额仍然高于其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而且其贸易依存度已很高。但问题是，下一步的中国战略走向将如何。客观地讲，中国在这一战略上的选择不仅对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同时也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未来增长路径

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里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

归功于改革与开放的战略与政策。正如张杰等（2007）所述，“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视角看，自1500年以来，大凡具有开放态度或秉持对外积极进取政策的国家，都或多和或少地取得过经济上的持续进步和成功。这种结果已经和正在表明，支持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诸如技术、贸易乃至制度结构等，在一个范围更广的空间里可能更易于提升其对经济的贡献度”。然而，一国对外开放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这对大国经济来说尤其如此。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如前所述的一国过高的出口依赖会导致结构上的问题与风险，从而会制约该国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潜力。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贸易量大增所导致的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即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低于其进口价格指数）。而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则反映了该国福利的实际损失。中国的贸易条件自9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

针对日益增加的出口依赖程度，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成功地遵循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即通过市场一体化来发展国内市场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增长空间，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获得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中国遵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增长模式，即不断地扩大其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那么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就会受到限制，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加大。近年来所出现的全球经济的失衡以及2008年所发生的世界范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正迫使中国作出这种战略上的调整。调整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和优化投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优化，相应的产品结构与档次的提高以及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都将有利于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调整的重点是中国的金融与融资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中国的汇率政策可视为调整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低碳经济与未来工业化进程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的是与日俱增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的压力。巨大的经济体及其增速和与之相应的碳强度结合在一起，使中

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对温室气体排放上面产生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影响。尽管人均排放量尚低，但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国，而且这种排放还在继续增加。因此中国要想继续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必须面对减排的挑战（宋立刚、胡永泰，2009）。这是因为，以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中国要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其人均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会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早期并没有面临这种要求与挑战。

从世界角度看，挑战在于如何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为开发不含温室气体的替代燃料提供充分的时间。就中国而言，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减至最小。这里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必须就经济高速增长与稳定排放之间择一而从，或者说，是否有办法使中国能够在未来25~30年内，实现既保证稳定的排放又保持经济增长这个双重目标的实施路径。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中国能否有效地转变其增长方式，将经济活动由能源密集型领域如重工业，转化成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和对能源以及其他资源投入依赖程度低的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此外，通过技术创新，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寻求新能源是解决既保护环境又维持可持续发展这一两难窘境的一种重要和长期的办法。

依照 Kaya 衡等式，总二氧化碳排放由下列因素所决定：总人口，人均收入、产出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碳密集度。在未来的2030年中，中国的总人口将继续增长，人均收入也会迅速提高。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也会不断上升，但以燃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中国政府把降低产出的能源强度或密集度作为减排的重点是十分正确的。其主要途径有：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和建立排放权市场。

四、人口结构的变化与未来经济的发展

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人口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即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要增加一倍。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中

国的劳动力供给速度和储蓄率将会下降（如日本的例子）。与此同时，赡养老人的社会负担也会加大。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相应地减慢。几年前，部分地区已出现过民工荒，基本工资亦有上升的趋势，总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也在稳定地下降。虽然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目前起到了一种减缓的作用，如失业率的上升，但并不能改变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长期应对措施包括放松计划生育的限制，提高劳动力参与率，通过教育来提高人口素质以及完善社保体制等。

五、几点结论

扩大内需以面对现阶段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不是针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基于中国长期发展目标战略上的调整。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仍将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贸易大国，即贸易总量还会继续上升。但是随着内需的不断扩大，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将会下降，由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将会不断地上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如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且还有利于保持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结构的平衡与稳定。20世纪初期的美国成功地进行了这样的经济转型与调整，并以此奠定了美国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强大与繁荣的基础。21世纪初期的中国是否也能成功地实施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转型与调整，并通过这一调整来奠定中国在本世纪乃至更长时间内的强盛与繁荣的基础。

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也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经济还远未达到世界生产率与技术前沿。这意味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可继续享有技术相对落后与赶超的优势。这一优势加之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将会使中国经济以一个较高的增速发展。同时，由于国内尚存在着很大的收入与地区差距，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不同于东亚工业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所谓的雁形模式，即中国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一个相当长的产业链与

产品链上保持着比较优势。这一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缓解既要产业升级换代又要考虑到增加就业的矛盾。这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造业仍会在中国经济（包括总产出和总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000 年时高达 51%，相比之下，美国相应的比重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达到高峰时也仅为 38%。当然，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会不断上升。伴随着制造业的崛起，中国也一定会向着作为一个金融大国的方向发展。与之相配合的是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也会加强。中国应审慎地考虑自己在全球经济联系中的定位并发挥其地位相应的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因为没有正常参与全球经济联系而损失掉的原本可以分享的巨额交易剩余，也包括其重要性远远超过这种经济剩余的全球贸易制度与规则的制定权和贸易安排权。”（张杰等，2007 年）

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同其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与政策是分不开的。应当强调的是，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事实上，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其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完成下一阶段工业化进程中结构的转型，以及取得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中国是否能顺利地深化并完成下一阶段改革的任务。中国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和原则的改革进程，继续实施国际化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具体来说，要深化要素市场改革（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包括水资源、能源与环境，外汇），深化金融市场与银行业的改革，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强化社会收入再分配功能，完善社保、法律与规制体制，大力开发人力资本，推进技术引进、应用、变革与创新并以此来促进全员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 Garnaut, Ross and Ligang Song, 2006, 'Rapid industrialisation and market for energy and minerals: China in East Asian context',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Springer), July, Vol. 1, No. 3, pp. 373 - 379.
2. Golley, Jane and Rod Tyers, 2007, 'China's growth to 2030: demographic

change and the labour supply constraint', Chapter 11 in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an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Press: Canberra, pp. 203 - 226.

3. McKay, Huw and Ligang Song, 2009, 'Global implications of China as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Chapter 13 in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Wing Thye Woo (ed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Press: Canberra and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Beijing, pp. 261 - 302.

4. 宋立刚、胡永泰（主编）：《经济增长，环境与气候变迁：中国的政策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5. 张杰、高晓红、李宏瑾：《全球经济演进：结构，逻辑与中国因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对于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

郭生祥：澳洲储备银行货币研究所精算中心研究员、荣誉主任。美国冈察加大学金融博士学位。在国内外主编、著作出版专著近三十多本，也是中国侨联特聘专家、马来西亚中央党校特聘研究员。

现代市场博弈，政府、学者、立法机构、商人都参与其中，但是必须各司其责，既不能串位，也不能失责，否则不是等于干预，就是等于缺位。中美之间的市场博弈，除了政府对政府、学者对学者，还应该有人大政协对参众两院，才能罗齐鼓齐，旗鼓相当。

一、摆在中美面前的“三菜一汤”

不难预料，只要美国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美国就会再拿人民币升值说事。尽管在危机的时候，中美两国似乎互相帮助，都施行积极的救市政策，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走在美国前面。但是危机过后，把危机归结为人民币的失衡，这种华尔街的声音也迟早会卷土重来，因为华尔街是现实的，好得快、忘得也快。果然，2010年美国的经济稍有复苏，美国就开始酝酿对人民币的围困策略，接过危机前的话，再次指责人民币被操纵，迫使人民币升值。

只要留意华尔街的道德史，肯定会知道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危机前，按照自由贸易原则，美国人大吃大喝了中国人的第一道菜，那就是沃尔玛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公然把中国商品要杀价到全世界最便宜的程度，几乎让中国企业没有什么利润可挣，他们的口号是为美国人购买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要知道中国人摆上桌的这道菜，在前面采购的能源、矿石、原材料、原器件、成套设备等资本设备都是最高价格买进的，进的是高价，出的却是低价，这中国商品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牛，挤出的是奶，吃的是草。

第二道菜是在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实行所谓的定量宽松政策，使美元大幅度贬值，让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贬值，而在经济刺激计划的时候，中国财政、货币投入量又是美国的好多倍，那拉动的大部分需求，不是过剩，就是对外需求，美国又是最大的收益。

第三道菜，在美国经济刚有复苏迹象的时候，他们先是瞄准低碳经济，再是瞄准恢复自己的制造业，二者的目标都是把矛头对准人民币，强迫其汇率升值，让其美元资产进一步贬值，这三道菜是环环相扣，真乃高明到顶的连环计，可惜的是秀水街上的人民币几无招架之功，那还有还手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谈人民币汇率的渐进性、可控性、灵活性，显然错误估计了形势。

二、“胎死腹中”

2010年3月北京一年一度的两会，我当时就想提个议案。如果得到立案，那么中方完全可以热热闹闹地提出要让美国政府为中国1.2兆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贬值保险，在当时还算先发制人，至少比现在被动的要好。

果然，两会后，也就是3月底，美国就加紧了对人民币施压，围绕人民币，采取的新策略是货币加民主的紧逼模式，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幸亏压人民币升值是伪命题，于是四月初旋即放下身段，自说自话地推迟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显得高风亮节。从1944年到1968年应该说是美元的格里芬悖论上升时期，之后是美元格里芬悖论的下坡路时期。1970年代的美国硬是把美元与黄金脱钩，换成自由浮动汇率，再巧妙地把美元与石油、黄金、粮食、高科技、主要贸易权垄断挂钩，硬是继续成功地充当了世界货币40年，其间还把马克、日元、欧元逼进了死胡同。现在是美元逼近人民币的时候了。

就汇率本身来说，即使当初有再多的不公平，但是只要实行了一段时间，一般2到3年，也达到了自己的生态平衡，一个习惯的叫法叫霍姆斯平衡。如果要纠正之，不顾客观条件和环境，为单方利益硬要蛮干，校正岂是一朝一夕之事？霸道的华尔街美元对于人民币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三、来而不往非礼也

2010年4月初访问印度后的盖特纳，在新德里不无针对性指出了美、印目前是一个战略合作机遇期，这话可能一是鉴于欧洲目前正每况愈下，二也是讲给北京听的，那就是北京如果不识相，印度是备用胎。尽管如此，盖特纳还是突访了中国。对于北京，盖特纳此时是无